

研究論文

會館、華商與華校的結合體制： 以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為例

利亮時*

摘 要

19世紀中葉，大量中國移民以勞工身份，湧入新加坡謀生。惡劣的求生環境讓這些刻苦奮鬥的移民意識到相互照應的重要。在他們之中，有因積極從商而致富的商人。這些商人為了團結移民社會，於是組織了會館，他們也自然地成為了這些組織的領導人。由於傳統思想的影響及他們在奮鬥過程中體認了教育的重要性，再加上殖民政府對華文教育的不干預政策，發展教育事業便成為會館的一項重要任務。在這種環境下，華商除了是商人的身份外，也是會館的領袖以及華校的創辦者。因此商人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的影響力從商場延伸到會館、華校，並把這三者緊密聯合在一起，形成新加坡華人社會特有的「三結合」機制。本文將以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為例，探討這個海外華人的獨有機制形成的原因以及其重要性。另一方面，亦勾勒客家商人在華文教育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英

* 單位職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通訊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
聯絡電話：07-7172930 轉 2579
e-mail：ph868989@nknuc.nknu.edu.tw
收稿日期：2009/04/09 接收刊登日期：2009/09/14

國殖民政府在 1950 年代初期處理華文教育的政策與態度。

關鍵字：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華僑、華校

Integration of Association, Chinese businessman and Chinese School: Char Yong (Dabu) Association as an Example

Leong-Sze Lee*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migrated to Singapore and worked as a labor there in the mid-19th century. Tough living environment reminded them of the importance of mutual care. With a fortune by doing business, some of these immigrants organized the association in order to unite this group and became its leader as a matter of course. Due to Chinese traditional thinking and the facts that they realized the significance of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working and that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did not intervene in Chinese's education policy, developing education became one of the association's important assignment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a Chinese businessman was not only a businessman but a leader of the association and a founder of an Chinese school. Accordingly, Chinese businessmen play quite an influential role in the society. Their influence extends from the market to the association and the Chinese school and tightly unites these three parts which form a unique connection in Chinese society in Singapore. This study takes Char Yong (Dabu) Association as an example and probes into how the connection is established and its importa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role Hakka businessmen play in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policy and attitude toward Chinese education at the

*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akka Culture Studi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beginning of 1950's will also be discussed.

Keywords: Char Yong (Dabu) Association, Chinese businessman,
Chinese school

一、前言

十九世紀中葉，大量中國移民以勞工身份，湧入馬來亞¹謀生。困難的求生環境讓這些刻苦奮鬥的移民意識到相互照應的重要。在他們之中，有因積極從商而致富的商人。這些成功的商人爲了團結當地的移民社會，於是組織了會館和商業團體，他們也自然地成爲了這些組織的領導人。由於傳統思想的影響及他們在奮鬥過程中體認了教育的重要性，再加上殖民政府對華文教育（簡稱華教）的不干預政策，發展教育事業便成爲華人團體，尤其是會館的一項重要任務。馬來亞早期華文教育的發展，深受中國的影響。19世紀中晚期的華文教育主要是私塾教育，直至中國維新運動之後，中國開始採用西方式的教育來培育下一代。中國教育的改變，也對馬來亞的華文教育產生影響，新式的學校開始在20世紀初出現。商人一直是華文教育的主要支持者，因此由商人主導的會館開始辦新式學校，例如當時的新加坡茶陽（大埔）館（簡稱茶陽會館）創辦了啓發學校；新加坡福建會館亦創辦了道南學校、愛同學校和崇福女校三間學校等等（茶陽（大埔）會館 144 周年紀念特刊 2001: 56；吳華 1975: 4-5）。在這種環境下，華商除了是商人的身份外，也是會館的領袖以及華文教育的創辦者，「多重身份」也讓華商、會館和華文教育形成了緊密的關係。本文的茶陽會館領袖，茶陽會館和啓發學校正是這種關係的例子之一。本文將勾勒華商與會館在華文教育所扮演的角色；二戰之後英殖民政府和後來人民行動黨政府處理華文教育的政策與態度；啓發學校的創立經過；以及現實環境的改變，華文

¹ 「馬來亞」一詞，在二次大戰前是指當時的英屬馬來亞半島，包括海峽殖民地（新加坡、馬六甲與檳城）、馬來聯邦（雪蘭莪、霹靂、森美蘭及彭亨）和馬來屬邦（吉打、玻璃市、丁加奴、吉蘭丹與柔佛）三區。二次大戰后，英殖民政府就政治因素，將新加坡從馬來亞分割出來，變成了兩個政治單位（Simandjuntak B. 1985: 60）。

教育處於不利的發展局面，華商、會館與華教的「三結合」機制，如何啓動應變之策。這都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二、 華商與華文教育

會館、華商、華教是新加坡²華人社會組成的重要部分，亦是東南亞華人社會一個維繫本身族群的機制。在這三結合體制之中，商人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他們的影響力從商場延伸到會館，再從會館進入到華文學校，並以商人為核心緊密的將會館與學校聯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的「三結合」機制。在這此機制下，商人成為了華人社會的領導者。當外在的威脅影響到這個機制中的任何一環時，華商就有挺身維護的責任。1950年代初期由於共產主義的威脅，華校生升學管道受阻，³以及殖民政府的壓縮政策，新加坡華文教育面對存亡絕繼的危機。這危難的關頭，也是考驗華人社會機制的一個契機。

殖民政府對於新加坡華文教育一直是採取「自生自滅」的政策，因此華文教育的發展，必須依賴族群的支持，而華文教育肩負傳承文化的使命。這也形成了華文教育與華人社會機制有著相互依存的關係。早期的華人社會，有許多是南來的中國商人。據東南亞著名學者王賡武教授的研究顯示，這些移民被歸類為「華商型移民」是18世紀中國移民的主流（王賡武 1987：6-7）。19世紀（1840年代）以後，中國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以及接連不斷的戰禍，嚴重破壞中

² 華商、會館與華校的結合，並非新加坡華人社會所獨有，在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地都是以這個模式在辦校。21世紀的今天，這個辦學模式仍存在於馬來西亞。由於本文是以新加坡為探討重點，所以並沒有去討論其他的區域。

³ 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建立政權後，英國殖民政府禁止新馬華人自由往來，這也讓華校高中生無法到中國升學。

國的經濟，人民生活陷入困境。當時西方勢力在東南亞殖民地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協助開發，因此向中國、印度尋求勞動力。內在貧困的推力，再配以外在需求勞力的拉力，使得大量的中國人民踏上東南亞謀生之路。在新加坡地區，殖民政府鼓勵商業活動，營造一個良好的商業環境，為這些南來的中國移民，尤其是商人，提供了許多營商的機會。⁴在「重商」的有利環境之下，華商階級的逐步形成，而華人的士階級在英文為主的社會，完全處於劣勢，商人自然成為社會的中堅（顏清滄 1992: 150-151）。殖民政府方面，在推動「重商政策」的同時，亦鼓勵華商進入華人社會的領導層，以用他們來控制華人社會。商人在殖民地的崇高地位，本身的財力，再加上殖民政府的支持，在重重的助力下，將商人送上族群領袖的寶座。

華商雖然得到殖民政府的重視，但是在心理上，仍然對故鄉（中國）有著難以割捨的情感，兼且他們在異鄉缺乏安全感，據歷史學者顏清滄的〈清朝鬻官制度與星馬華族領導層（1877-1912）〉一文中指出“傳統觀念、心理需求、社會聲望、領導權，以及缺乏之安全感，促使他們鬻官買爵。”（柯木林、吳振強 1972: 49-87）。當清朝滅亡之後，他們無官可買時，他們開始尋求其他途徑來鞏固自己的地位，於是他們成立行會、宗親團體、會館，把自己和族群組成一個「生命共同體」，以取得族群社會的領導地位。⁵會館等組織成了推動文化，聯絡同鄉感情和讓商人推進業務的場所（何炳棣 1966: 10）。會館的運作需要的是經費，因此商人便能憑藉雄厚的財力，

⁴ 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在新加坡開埠後，開始實行重商主義政策，即給予商人特殊優待，處處保護商人的利益，並且公開宣稱商人階級是新加坡社會的中堅分子（林孝勝 1995a：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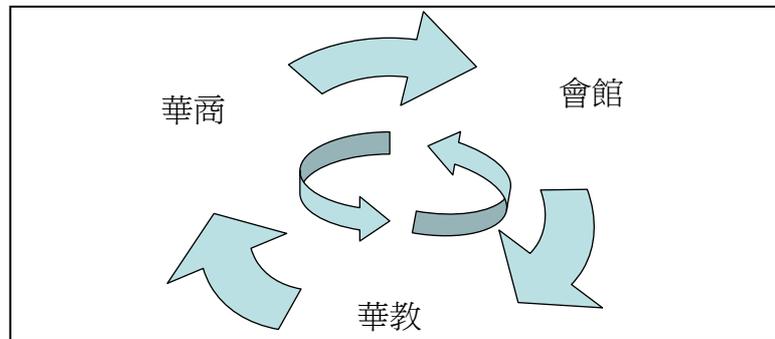
⁵ 例如四邑（新寧、新會、恩平和開平）人士設立的北城行和曹家館，南海和順德邑人成立南順會館（林孝勝 1995b：44-45）。

順理成章登上會館的領導階層，從而強化他們在華人社會的地位。

會館組織既然由華商領導，他們就有責任出錢出力辦教育。這樣除了有助於他們獲得族群的認同與讚揚，提高和維持他們在族群的聲望和影響力外，同時也履行了他們作為社會領袖的義務。於是我們看到商人領導下的會館紛紛成立華文學校，例如茶陽會館於1906年由劉春榮領導創辦啓發學校（新加坡茶陽會館百年紀念刊1958：10）；應和會館也在黃雲輝等領導下，於1904年創辦應新學校（應和會館181周年會慶暨大廈重建落成紀念特刊2003：94）。這些20世紀初期學校的成立，正是華商、會館與華文教育結合的成果。

換言之，華商、會館和華文教育，已形成為一個「三結合」的緊密機制。在這個機制底下，華商擁有商人、會館領袖和學校創辦人的「多重身份」，這正是確立華商在華人社會的領導地位。（參看圖一）從20世紀初至中期，許多的商人，如客家籍的劉春榮、黃雲輝，福建籍的陳六使，潮州籍連瀛洲等都是在這個機制中，鞏固自己在族群中的領導地位。而人數佔華人四成和擁有強大經濟勢力的福建領袖，更在此機制下成為華人社會的「共主」。

圖一：華人社會機制中「三結合」示意圖



圖一顯示了華商在整個「三結合」裡頭的重要性和多重性，本身是經營生意的商人、另一方面也是會館的領導人，以及華文學校的主要贊助人。這些關係都強化了商人在華人社會的地位，而在族群教育出現危機之時，商人就成爲了族群教育與文化的捍衛者或代言人。「三結合」能夠充分發揮其效能，正是新加坡華文教育所存的困境，必須仰賴該機制的幫忙。以下將先行探討新加坡華文教育的發展概況，以及二次戰後所面對的問題或困境，從中可以看到「三結合」機制在當中的重要性。

三、 二次戰後的新加坡華文教育

華商、會館和華文教育的結合，使華商成爲這個機制中的重要樞紐。當任何一環遭遇危機時，華商都必須設法來化解。誠如前述，20世紀之初新式華文教育的萌芽，商人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而當1950年代華文教育面臨存亡的困境時，華商自然也要挺身而出來解救。

新加坡華文教育始於19世紀中期，最初是沿用中國傳統的私塾教育，教學內容以《孝經》、《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爲主。19世紀末，維新派人士和革命黨員南下新加坡。兩派人馬除了宣揚各自思想外，更極力倡議設立新式學校。在這些人的影響下，華文教育開始以西方概念辦新式學校，取代私塾教育。新加坡華文教育的革新，仍然是以中國作爲因襲的對象。就學制而言，小學六年、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是中國新學制的翻版。在課程方面，科目都是按照中國的模式，教科書也是採用中國的中華、商務等書局編印的課本；師資方面則以中國南來的教師爲主（王賡武 2002: 39-40；崔貴強 1990: 19-20）。這種移植式教育，使學生的意識形態深受中國的影響。當時學生所關心的是中國事務，熟悉的是中國的歷史地理。

殖民政府開始察覺華文教育發展，很可能會對他們的政權產生負面的影響，於是一改之前放任華文教育發展的政策，而在 1920 年頒佈《學校註冊法令》對當地的華文學校進行管制。該法令規定只要一所學校的學生人數在十名或以上，就必須向政府申請註冊。某學校若被發現有妨礙地方安寧時，政府有權取消該學校的註冊(Doraisamy, T.R., 1969: 86-87)。1920 年代開始，華文教育由放任發展，進入受政府監督的階段。

二戰結束後，國際局勢的變化不利於華文教育的發展。世界出現了兩大陣營。美國與西歐諸國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1949)。蘇聯則將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東德、南斯拉夫等納入共產勢力範圍，組成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 1955)。兩股國際力量呈現對立的內政建制、經濟制度和對外政策，使得世界處於冷戰的局面。兩股力量在亞洲地區不斷暗中角力，以中國為例，兩股力量分別支持下的國民黨與共產黨，便以武力爭奪中國大陸的統治權。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國共產黨擊敗國民黨宣佈共和國政府成立，共產主義即在亞洲大陸佔有龐大的根據地。爲了防止共產勢力進一步擴張，美國遂聯合其他歐、亞、美各洲的盟國，對共產勢力，包括中共政權採取圍堵政策。

二次大戰後，大部分東南亞地區仍屬殖民地。戰爭的失利，使各地殖民政府的控制權大受動搖。中共成功擊敗國民黨政權，更鼓舞了各殖民地人民藉武力爭取獨立的行動，也讓殖民政府面對嚴峻的考驗。新加坡社會的左傾意識形態，二戰前早已在華人社會流傳，

⁶馬來亞共產黨（Malayan Communist Party，簡稱馬共）也於 1930 年 4 月成立(Khoo K.K 1984:25)。共產思想的進入，正對華人青年造成頗大的影響。抗日時期，新加坡與馬來半島抗日分子多是華人，他們組成抗日組織「馬來亞人民抗日軍」(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其中便有許多是馬共成員（新馬僑友會 1992: 14-17）。二戰結束後，因抗日而壯大的馬共，⁷不被殖民政府接納為合法組織。於是他們發動武裝政變，冀望奪取殖民地的政權，以建立馬來亞共產黨政府。為了保護本身的利益，殖民政府全力圍剿馬共，以致發生了 1948 年的「緊急狀態」(Darurat)(Ongkili J.P 1984: 5-9)。

共產主義的滲透工作，令殖民政府對華文教育的政策有所改變。1949 年之後，殖民政府的華文教育政策有所改變。1950 年殖民政府推出《五年教育補充計劃》，該項計劃著重發展英文教育，提供各種優惠政策與華文學校進行競爭(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nual Report for 1950 1951: 57-59)。殖民政府的意圖十分明顯，正如當時馬來亞大學教授費德烈麥臣(Frederic Mason)對新加坡教育政策所作的評論：「……戰後的新加坡教育政策，積極擴充與發展英文教育，並以較其他源流學校更低廉的學費來吸引家長把其子女送入英文學校就讀。此舉是間接的將一些政府難以控制與規模較小的華文學校學生，吸收到政府辦的學校去。……」(Mason Frederic 1957: 25)《五年教育補充計劃》推出後，殖民政府在同年頒佈《學校註冊法令》，賦予註冊官掌控學校存亡的權力(The Laws of the Colony of

⁶ 自 1924 年，中國共產黨便已開始派人到馬來亞和一些遠東地區宣傳馬克思主義。1926 年，新加坡「共產青年聯盟」(Communist Youth League)成立，他們對當時的華校和夜校進行思想宣傳，造成很大的影響力。(Gwee Hock Aun 1966: 1; Hanrahan G.Z. 1954: 8)。

⁷ 二戰前的馬共沒有游擊隊組織，但日侵時戰敗的英殖民政府，希望民眾支援他們抗日，因此鼓勵馬共組織游擊隊來抗日。日軍投降後，馬共在各地搜獲許多遺棄的兵器、彈藥和糧食，這都增強他們的武裝勢力（韓元山、李永樂 1988：22-23）。

Singapore Volume V 1955: 630-646.)。此舉進一步威脅華文教育的發展。在殖民政府眼中，讓華文教育繼續發展會威脅他們的既定政策和利益。

1956 年南洋大學的創立，正是華人社會「三結合」機制的總動員，最後促使了這一所，也是東南亞地區至今唯一以中文作為教學媒介語大學的設立。南洋大學的設立，確實為華文教育的發展注入了一劑強心針，但是效果是短暫的。該大學的設立仍無法逆轉華文教育發展陷困的頹勢，也無法抗衡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英文至上的教育方向，一直是殖民政府教育政策的中心思想，該政策亦在後來由人民行動黨政府所繼承。華文教育的發展就在「三結合」的堅持下，逆流奮進。奈何局勢的發展，越來越不利華文教育。1965 年新加坡獨立建國後面對的外在威脅，讓教育政策繼續朝以英文，作為統一各源流教育的目的邁進。在這種情況下，形成了華人社會「三結合」機制與教育政策的角力戰。兩方的角力戰直至 1980 年代後期才宣佈結束，而「三結合」體制全面潰敗。華文教育在 20 世紀的前 60 年，歷經了起伏、興衰，而茶陽會館所辦的啟發學校所走過的發展道路，正是華文教育發展的縮影。

四、 啟發學校的創立

清朝末年，中國的維新派與革命黨，為了尋求海外的資助，紛紛出洋至東南亞或美國。維新派與革命黨人士為東南亞帶來了新思想與新的教育制度，新加坡受到這股思潮的影響。新觀念與新式教育的傳入，使得私塾教育走入歷史，而西方式的教育則成為之後辦教育的參考重點。當時的商人都意識到新式的教育的重要性，而紛紛出資興辦，啟發學校亦是新加坡最早的新式華文學校之一。啟發

學校創辦於 1906 年，當時的客家籍商人劉春榮爲了讓同鄉子弟能夠接受新式的教育，便發起籌款，並租下陸佑街(Loke Yew Road)的店屋，創辦了啓發學校，開辦之初學生有六十多人。該年的 11 月 1 日舉行開學典禮（星加坡啓發學校校刊 1）。

1911 年，總理藍鏡清與諸董事，以租店屋爲校舍，在設備相當不足，再者是租金增加了會館的負擔。爲此藍鏡清與領導層召眾議決，將會館增建三樓，以作爲校舍。當時的學生已經超過了百人（星加坡啓發學校校刊 1）。1917 年何仲英任總理，會館進一步擴充校務，購禧街 32 號之房屋改建爲校舍，學生增至三百多人（星加坡啓發學校校刊 1）。

1937 年茶陽會館的領導人張夢生，聯合其他客籍商人林師萬、陳翰生等爲啓發學校購置禧街 29 號店屋，該處有 10 間課室，學生因此增至五百多人（茶陽（大埔）會館 140 周年紀念特刊 129）。二戰後許多在戰時失學的青年，求學心切紛紛報讀華文學校，使得當時的華文學校一片興旺。爲了應付日益增多的學生，茶陽會館會長張夢生領導董事部，進行擴建學校的工作。華文教育在二戰之後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然而好景無法維持太久。共產主義往東南亞的擴張，令殖民政府相當擔心華文教育會成爲共產主義的宣傳工具，於是多管齊下來抑制其發展，包括不給予經費補助，不承認華文學校的學歷，營造不利華文學校畢業生謀生的環境。這些因素都對華文學校的發展形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然而，在商人的支持下，學校仍然在逆境中奮進。1950 年代茶陽（大埔）會館領導人張夢生就曾宣誓會館全力辦學：「本校是華僑教育機關之一，辦得好或壞，一樣會影響整個華僑教育，所以負責辦理本校的茶陽會館董事部，誠惶誠恐，惟恐有負重大使命，會館董事部的工作任務，最

高目標也就是辦理本校。」（星加坡啓發學校校刊）

茶陽（大埔）會館，商人與啓發學校是眾多「三結合」機制的其中一個。茶陽（大埔）會館的領導人（另一身份是商人）爲了取得族群的認同，必然會全力推動教育事業。啓發學校從創辦至二戰復校，每任領袖都出錢出力的擴充學校，這都是明顯的例子。學校在收生方面，全面開放給適齡入學的學子，這也令學校有長足的發展。「三結合」機制成爲了華文教育的重要支柱，但是在後殖民時代，教育政策仍是「重英」（以英文教育爲主），這將使得華文教育的前路荆棘滿途。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逼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在教育政策上，推動了以英文爲主，其他語文爲輔的政策。上述教育政策的推行，壓縮了其他語文學校的生存空間，當時的啓發學校也面臨發展的危機。1985年，啓發學校董事部與教育部協商，決定該年停辦原有的啓發學校，由教育部在西海岸路50號另建新校舍，茶陽會館捐獻新幣10萬元（台幣約2百萬）協助學校的發展，該新學校取名爲啓發學校。新的啓發學校亦邀請茶陽（大埔）會館選派董事出任學校諮詢委員會之成員。昔日的啓發學校雖然不復存在，但是在茶陽（大埔）會館領袖的努力下，校名是保存下來。會館在新學校仍有些許影響力，這或多或少可以讓啓發學校多些「華」的氣息。啓發學校的興辦得力於商人主持的會館，而其走入歷史則與新加坡的教育政策有莫大的關係。

五、 「三結合」機制的式微

人民行動黨，自1959年上台後，歷經了1963年的馬來西亞合

併，以及 1965 年的建國獨立。該黨的教育政策，一直以務實為其目標。為了將新加坡打造成東南亞的樞紐，以及避免讓周邊的國家視為「第三中國」，而致力減少新加坡「華」的成份，殖民政府之前的教育政策（英文為主要媒介語）符合了新加坡未來發展的利益。人民行動黨的教育政策雖然繼承了殖民政府，但是在現實的考量是略作了改變：以英文為主，各族群語文為輔。人民行動黨政府按照上述的方式著手改革全國教育制度，以制訂全國統一的教育制度，建立一個適應新環境的教育制度，消除各語文族群之間長久以來隔閡、甚至是互相猜疑的風氣，以塑造一個共同效忠新加坡的多元族群社會。從殖民政府至人民行動黨政府的教育政策，造就這個社會需要的是英文學校或英文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而不是由其他語文教育所培育的人才。在這種大趨勢底下，華文教育面臨生存的危機。從 1950 年至 1953 年間，華校學生人數只從 72,951 人微增至 79,272 人。反觀同時期的英校，學生人數卻大幅度增長，從 49,521 人增至 1953 年的 71,003 人 (Annual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1945-1958) 1959)。1960 年代華校學生人數，更呈現負成長的窘境。「三結合」機制雖然不斷資助華文學校，甚至在 1956 年成功創辦南洋大學，然而這些努力都無法改變一個事實：學生畢業後沒有出路。在文化傳承和學子未來出路的兩項選擇下，大部分的家長選擇了後者，這導致華校學生的銳減。茶陽會館在 1985 年停辦啓發學校，正是因為學校沒有生源，在「有校無生」的情況下，停辦是唯一的選擇。

1980 年代後期，華文學校正式走入歷史，這也象徵著「三結合」機制的退場。教育的興辦完全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政府正努力塑造一個不分族群，不分語言的「新加坡人社會」，商人的族群代表角色自然沒有必要再強調。華文教育舞台的消失，令「三結合」退場，

而商人領導的會館正在尋求另一個舞台來繼續發揮其功能。新加坡華文學校已經消失在教育版圖中，剩下的只有華語教育，⁸會館與商人在這個僅有的陣地，扮演鼓勵與支持的角色，讓中華文化能夠繼續的傳承和發揚。因此，茶陽會館等社團組織設立華文科成績優良獎金，舉辦文化活動等等，以此來延續文化的傳承。「三結合」的瓦解，並不代表商人與會館完全放棄維護教育與文化的責任，會館與商人除了頒獎學金，辦文化活動外，仍嘗試透過參與學校的發展來影響學校的辦學方向，例如啓發學校已經隨著其他華校在 1980 年代關閉，而茶陽會館的董事仍願意參與新學校的諮詢委員會，他們除了影響學校把校名取名為啓發之外，會館的領袖亦希望透過參與校政，把學校的「中華」色彩提高。「三結合」機制已經完成其階段性的歷史任務，但是文化的發揚與推廣，卻成為商人與會館的下一個任務，而「三結合」正在以另一形式來發揮其功能。

六、 結 語

華人社會獨特的「三結合」機制，提供華商成為社會的領導者。這種特殊的社會環境，也使華商和華文教育形成一個緊密的關係。為維護他們在社會的地位，必須在華文教育上有所貢獻。1950 年代的華文教育產生很大變化。二次大戰後，國際局勢的轉變影響了新加坡社會情況。亞洲共產勢力的擴張，使新加坡華人社會的政治傾向受到殖民政府的質疑。政府的許多既定政策，旨在加強管制華人社會的發展，避免華人走向左傾。華文教育首當其衝，成為嚴格管

⁸ 華文教育與華語教育的差別在於華文教育指的是學校裡的主要授課媒介語為華文，校內行政用語也是華語。華語教育指的是華文只是學校的一門科目而已，其他課目是用英文授課。

制的目標。對外方面，政府禁止新加坡人民與中國人民往來，導致華文師資來源和華校生升學管道中斷。在內則是採取重英抑華的教育政策。華文學校在面對擁有龐大資源的英文學校競爭時，陷入了掙扎求存的困境。然而，二戰期間大量的失學青年成爲了華文學校的主要生源，殖民政府的政策暫時無法對華文學校產生立即的負面影響。從茶陽會館創辦的啓發學校，正可以窺探華商、會館與華校的「三結合」模式的成功。另一方面，從啓發學校的創辦至關閉，正是華文學校或華文教育發展史的縮影。啓發學校的艱苦經營，直至關閉，也正是人民行動黨政府務實教育政策下的結果。新加坡華文教育的消失，剩下只有「華語教育」，這也代表著「三結合」的終結或退場。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商人與會館也從此瓦解，他們仍在文化中扮演推手的角色，讓華人文化能夠在這新加坡這片土地上繼續傳承下去。

附錄：啟發學校大事紀

- 1906年：大埔人劉春榮、張讓溪、劉問之、張讓皋、陳龍曾、藍森堂等發起捐資，為大埔移民籌辦學校，命名為「啟發學堂」。
- 1906年11月：啟發學堂舉行開學典禮。劉春榮獲推舉為首屆總理(董事長)，董事會聘請李辰五為校長，當時學生有六十多人。
- 1911年：啟發學堂在陸佑街的校舍無法容納日漸增加的學生。當時總理藍鏡清與董事決定將北京街茶陽會館加以修整，增建三樓。茶陽會館完成擴建後，啟發學堂遷入會館之內。
- 1918年：啟發學堂與茶陽會館，由北京街搬遷至禧街31號。
-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新加坡淪陷，而啟發學校和茶陽會館均毀於炮火。
- 1947年：茶陽會館會長林師萬領導，重新購置新加坡東陵街經禧路30號為館址，隨著動工興建會所，籌備復辦啟發學校的工作。同年，會館與學校遷入新址辦公與上課。
- 1952年：新校南舍落成啟用，計有教室10間。
- 1955-1966年：為了應付日漸增加的學生，茶陽會館擴建北舍教室、學生食堂、職工宿舍、幼稚園和運動場等。前後共耗資七十餘萬元。1966年擴建工程，全部完成。
- 1984年：啟發學校因為受市區重建和教育政策改變的影響之下，學生遷徙四散。
- 1985年：茶陽會館董事部與教育部協商，決定停辦啟發學校。教育部在西海岸路50號另建新校舍，茶陽會館捐獻新幣10萬

元協助學校的發展，保留了「啓發」的校名。學校方面，邀請茶陽會館選派董事出任學校諮詢委員會的成員。

資料來源：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特刊編委編，1997，《茶陽（大埔）會館 140 周年紀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特刊編委編，2001，《茶陽（大埔）會館 144 周年紀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

參考書目

- 1948年啓發學校畢業生編，1948，《啓發學校復校後高小首屆畢業紀念特刊》。新加坡：啓發學校。
- 《中華總商會第十一次董事會議記錄》，1953，新加坡：中華總商會。
- 《南洋商報》（新加坡），1951年。
- 王賡武，1987，《中國與海外華人》。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_____，2002，〈海外華人：未來中的過去〉。劉宏、黃堅立編：《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王賡武教授論文選》，32-59。美國：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 何炳棣，1966，《中國會館史論》。臺北：學生書局。
- 吳華，1975，《新加坡華族會館志》。新加坡：南洋學會。
- 林孝勝，1995a，〈開埠初期的新華社會〉。林孝勝：《新加坡華社與華僑》，1-27。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 _____，1995b，〈十九世紀新華社會的幫權政治〉。林孝勝：《新加坡華社與華僑》，28-62。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 茶陽會館編，1958，《新加坡茶陽會館百年紀念刊》。新加坡：茶陽會館。
- 柯木林、吳振強編，1972，《新加坡華族史論集》。新加坡：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
- 啓發學校校刊編委會，1953，《星加坡啓發學校校刊》。新加坡：啓發學校。
- 崔貴強，1990，《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 1945-1959》。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
- 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特刊編委編，1997，《茶陽（大埔）會館140周年紀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
- 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特刊編委編，2001，《茶陽（大埔）會館144周年紀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

- 新加坡應和會館特刊編委編，2003，《應和會館 181 周年會慶暨大廈重建落成紀念特刊》。新加坡：應和會館。
- 新馬僑友會編，1992，《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香港：香港見證出版公司。
- 謝希亮編，1932，《星加坡啓發學校半年刊》。新加坡：啓發學校。
- 謝希亮編，1933，《星加坡啓發學校半年刊》。新加坡：啓發學校。
- 顏清滄，1992，《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 韓元山、李永樂，1988，〈戰時馬共組織概況〉。韓元山、李永樂：《馬共秘聞》，22-25。新加坡：勝利出版私人有限公司。
- Annual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45-1958)*, 1959,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nual Report for 1950, 1951*,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er.
- Doraisamy, T. R., 1969, *150 Years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ingapore: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Colony of Singapore: Ten Years —Programme*, 1948,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er.
- Gwee, H.A., 1966, *The Emergency in Malaya*. Penang: Sinaran Brothers Limited.
- Hanrahan, Gene Z., 1954, *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Malaya*.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 Khoo, K. K., 1984, "Gerakan Komunis di Tanah Melayu Sehingga Tertubuhnya PKM." Pp. 25-40 in *Darurat 1948-1960*, edited by K.K. Khoo dan Adnan HJ. Nawang. Kuala Lumpur: Muzium Angkatan Tentera.
- Mason, Frederic, 1957, *The Schools of Malaya*. Singapore: Donald Moore.
- Ongkili, J.P., 1984, "Darurat dan British, 1948-1960: Suatu Pernilaian."

Pp. 5-9 in *Darurat 1948-1960*, edited by K.K Khoo dan Adnan HJ.Nawang. Kuala Lumpur: Muzium Angkatan Tentera.

Simandjuntak, B., 1985, *Federalisme Tanah Melayu 1945-1963*.

Petaling Jaya: Penerbit Fajar Bakti.

The Laws of the Colony of Singapore Volume V, 1955,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er.

Tregonning, K.G., 1966,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Donald Moore.